

V-26/55

榆次文史资料

第 十 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次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史要載之以文
離文無以言史

贈榆次市文史資料

王西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王西题词

以史为鉴
启迪后人
郭保才

市政协主席郭保才题词

纪 念

榆次解放四十周年

总第十期

目 录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战 斗 烽 火

榆次抗战初期鸟瞰	范维屏	(1)
长凝第一仗	陈 模	(13)
榆次军民支援百团大战	田民才	(16)
支援晋中战役	郑景云	(22)
榆次解放纪实	陈 模	(24)
迎来抗战胜利之曙光	郑景云	(26)

榆 史 拾 遗

榆次史话(中)	郑景云	(29)
车辋常家	常士晔	(39)
藁郊与藁相如	刘怀仁	(52)
李自成兵伐榆次	刘怀仁	(54)
话说“三郝瓜”进贡	吴廷鸾	(56)

教 育 春 秋

忆魏榆职校师生的进步活动	李维让	(78)
抗日、解放战争时期的榆次教育	杨文宏	(84)

文 化 园 地	郭继泰与他的自传体小说《带印奇冤郭公传》			吴廷鸾 (100)
	明清以来榆次文人老艺人简介			赵水林等 (104)
	榆次文物考 (上)		郭思俊 程耀武	(116)
	榆次民间艺术 (上)		郭思俊	(138)
	解放初期的榆次文化馆		潘 玲	(154)
	艺人苦		郭思俊	(159)
亲 历 见 闻	解放前夕蒋阎太原密谈		李寿山口述 魏唐整理	(161)
	大峪口惨案见闻		李宇信提供 陈模整理	(162)
医 卫 篇 章	老中医——肖广业		肖凤鸣	(165)
	针灸妙手——康垣		马跃华 康永恒	(167)
	榆次第一位妇产医师			
	——张淑善女士		王耀生	(170)
社 会 角	“一贯道”在榆次的活动			林娃 (176)
信 息 与 动 态	榆次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简介			颀江整理 (189)
	收录乡土人物的公开信			市委史志办 (195)
	《榆次文史资料》一至十期总目录			(196)
文 百 史 小 科	①梯云阁始末	②话说军衔	③我国最早获得 军衔的人	
		④楚河、汉界在哪里		

榆次抗战初期鸟瞰

范维屏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时候，榆次城内正在赶传统的五月会。在那十分热闹的时刻，“考院”后大门墙上贴出“日军进攻芦沟桥、宛平县城，我二十九军守军起而应战”的号外。然而看号外的人并不多，有的瞥一眼就过去了，赶会的人群都忙着买东西看热闹，好象没有发生过“芦沟桥事变”一样，五月庙会还是照常热闹红火，商人们仍在忙着做生意，军政二界，也是安然如常。太原来了个鼎鼎有名的军界人物，带着年轻的姨太太买古玩、置家俱。城隍庙里照常敬神、唱戏。虽然太原府也来了“牺盟会青年先鋒队”的宣传队，码住戏给百姓宣讲日军进攻是为了灭亡我中国等道理，人们还是盼他快点讲完，好看戏。这种太平景象一直继续到七月下旬。

天津紧张的消息传来，从石家庄回来的人证实了中央军正在接连不断往北开，仗是非打不可。这才使赶会的商人急忙收拾东西，各回各店号，两三天“考院”就空荡荡了。

“考院”空了没有几天，支差车辆就成百的集中到这里了，山西军队已经开始走向抗战前线。接着张家口、石家庄先后沦陷，山西成了首当其冲的战区，支差的车辆来的来走的走，源源不断。

同蒲、正太两条铁路开头是夜里运兵，以后就不分昼夜的向北向东运兵。这时，大多数老百姓们还怀着侥幸心里，也许日本鬼子打不到咱这里吧？但是，在八月十五日正当人们用月饼供献

月亮的时候，日寇的轰炸机轰炸了省城太原。从这时起，城里人才开始向四面八方疏散，眼看着战局紧逼到眉棱骨上了。

“牺盟会”在榆次

“牺盟会”在发动抗日上起了重要作用。“牺牲救国同盟会榆次分会”的牌子，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就挂出来的，那牌子是在榆次城教育会院门口和“榆次县主张公道团”的牌子一左一右地挂着，但人们却常看见那个公道团长陈某出进，却看不见牺盟会的人，直到芦沟桥事变以后，“牺盟会”才有了特派员，重新设立了一处单独的驻址。

特派员阎定础同志六月就来了榆次，在北关一家栈房里住，以后才给安排到寇家巷“家礼”的香堂院内一间房子里，管事的姓陈，人们叫他陈老大，阎定础就搭伙食在一起吃饭。七月二十日又来了一位赵道五同志，他们二人都是特派员，是牺盟总会政训队毕业的，都是老党员，都蹲过阎锡山的监狱，阎定础同志是二七年的党员，长期做地下工作，赵道五同志来后，二人住在这间房里，总算有了办公住宿的地方。

怎么样能把“牺盟会”张扬出去呢？按当时的人力物力等条件只能办两件事，一是用“牺盟会”名义出墙报，一是走访工厂学校，把墙报办好，马上就出了“牺盟墙报”，张贴在北门洞、衙门口、南门洞和五月会上。阎定础同志来榆次后，就和晋华厂联系过，在厂里发展牺盟会员。因为有公令，厂方采取了应付办法，找来个叫朱金楼的工人，由他做登记会员的工作，填了不少表，但这表没和本人见面。九月，时局日见紧张，牺盟会的活动也深入了，发觉工人积极分子很讨厌朱金楼，叫他是朱麻子（脸上有麻子）。工人們的抗日情绪很高，两三天工夫就有几十个积极分子直接到牺盟会找特派员，要求牺盟会领导他们。晋华纺织

厂有三千多工人，阎、赵两位特派员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工厂工作上了。

榆次县城当时有一所中学，叫“私立魏榆初级职业学校”，是榆次资本家宋启秀出资办的。有一所女子两级小学校，一所县立高等小学校，一所私立两级小学校，一所模范小学校，东街还有一所初级小学。这些学校集中了上百名教员，数百名男女学生。“七七”事变的时候，各校正放暑假，虽然发生了偌大的事变，但榆次县的知识界悄悄无声若无其事，直到学校开学以后，才有上街宣讲之举。可是这时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山西境内了。旧历八月十五敌机夜袭了太原以后，大多数学校的学生、教员都回家了，牺盟会的两名特派员，曾经走访过“职中”和私立两级小学校，那只是一般的见见面应酬一番罢了。其实知识界有两种人：

一种进步的教师，如职中的史子谦、闻仁甫，龙王庙小学的范新三，女校的郑允文、刘兴哉，这些人热心抗日救亡，但对阎锡山办的事概持怀疑态度，由于有戒心，牺盟特派员走访，并没有推动他们积极起来和牺盟会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，仍然持冷眼旁观的态度。十月中旬赖际发同志到榆次设八路军办事处，那时，史子谦、范新三、闻仁甫，以及巩廓如等七、八名教员，都自愿参加了八路军。郑允文则跟随从城里撤出的工人自卫队上山去打游击，李海仙、李海燕姊妹二人和工人抗日自卫队一齐上了山。

另一种是随波逐流的。这种人有两类，一类是缺乏民族自尊心，这是少数；一类是形势所迫，看风使舵的居多，这些人在形势顺利时上山抗日，形势恶化了又有不少妥协回家。

榆次有成百的中学生和高小生，但上山打游击的人在一九三七年只有李维让等二人，一九三八年随路北工作团到路南来的有寇宏业、王鸿岗、杨作人等十多人，可见当时牺盟会在知识界的

工作是较弱的一环。

但是，牺盟会在晋华纺织厂的工人工作是卓有成效的。

随着张家口、大同陷落，山西就成了前线。阴历九月，敌机开始轰炸榆次车站。晋华纺织厂在敌机轰炸后，白天停工夜间开工，从那时工人往“牺盟会”去看形势，去谈时局的就多了起来，对朱金楼到太原去出席牺盟代表大会意见很多，工人们说他是厂方的人，不是工人代表。牺盟代表大会开完朱金楼回榆次后，见自己的面目暴露了，也就再没到“牺盟会”去过。到了十月敌机加紧轰炸榆次，厂方借机宣布完全停工，三千多工人无工可做，吃饭就成了问题，工人到“牺盟会”来谈这个停工问题。怎么办？工人希望“牺盟会”帮助想办法。

阎定础、赵道五这两位共产党员，靠着自己的政治敏感，和常来牺盟会的积极分子商量解决停工问题的办法。他二人到工人聚居的晋华街和寿安里，去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，然后和工人积极分子郑鹤龄、张效良、宋连芝等商量出串连全体工人，找总工程师请愿，要求发放遣散费的办法。经过二、三十名积极分子串连，一天时间就有一两千工人集合到那个黄总工程师公馆去请愿。

工人请愿的运动在紧张进行，同时，战局也在急剧的变化。“牺盟会”从太原疏散到榆次分会的人来了，他们是张玉麟（总会常委）、杨蕴玉、郝艾、宋××、每人佩带山西造冲锋枪一支。他们到来，表明战局在恶化，省里的各衙门都在悄悄的向南撤，增援前线的军队往东开，从前线撤退的军队往南撤，榆次城里城外都是兵，开上去是整整齐齐的兵，退下来的是松松垮垮的兵；街上的字号里都住满了兵，只见兵，不见老百姓，真是兵慌马乱。

敌机空袭榆次也加紧了，郭村铁桥被轰炸了多次，同蒲车站，正太车站都被炸过，一两千人的群众集会只能在夜里进行。

成千人在黄总工程师公馆外边，喊着口号：“拥护阎会长守土抗战的主张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坚决要求厂里发给工人遣散费！”工人们推派的代表郑鹤龄、张效良、宋莲芝等人要求黄总工程师答复。但公馆不给开门，在门里说总工程师到太原了。郑鹤龄找阎、赵二特派员商量怎么办？二位特派员和张玉麟、杨蕴玉一起研究了一下，又分析了积极分子反映的情况，然后说道：“这是他用这办法缓和群众的斗争情绪，要继续要求他们出来和大家见面，同时需要做进一步的准备，若他死拖着不出来见面时，我们要组织纠察队，把他的家看起来，把他出去的路口也看起来”。商量完后，郑、宋等工人代表就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布置了喊口号：“要求总工程师出来和大家见面！要求厂里发给工人遣散费！不答复要求我们不散！”口号声此起彼伏呐喊了一阵，不见动静。工人群众确有些松懈动摇，有的就开始悄悄的溜了，忽听得前边有人喊道：再不出来，我们就上房。果然，有人喊：来，我上去，谁来往上架我？当下就有几个人出来架人梯。这时忽听得门里说：“诸位工友们，请推派代表进来见黄总工程师。”郑鹤龄说：“代表早就等着你，开门吧。”又等了一阵门里说：可要说好，只许代表进来。郑等同声答应后，门就开了一个小缝，里边说：进来！郑鹤龄、宋莲芝、张效良等七、八个代表都从门缝里挤进去，外边工人喊口号给代表助威，“要求厂里答复工人要求！不发给遣散费我们不走！”这一阵口号又把工人情绪稳定住了，经过半小时代表们从公馆出来了，向工人群众宣布接见的情况说：“总工程师说他不能做主，得请示上方”。代表们研究后觉得有理，便同意了迟一天答复。群众又喊：不答复要求不行！郑鹤龄说：厂方狡猾，是在欺骗工人，在拖，我们要团结起来斗争到底。然后他宣布成立纠察队，报名的人很踊跃，几个代表分别当了纠察队长，除纠察员，其他工人群众就解散回家去了。

请愿后的第二天，郑鹤龄、宋莲芝几个人到牺盟会说：清早

黄总工程师坐着福特汽车从晋华街出来，被我纠察队发现时阻拦不了，汽车往城里开，纠察队跟着追，一直追进城，越追人越多，直到南关那里才拦住，又正赶上敌机扫射，他看看走不了，又返回公馆去了。

第二天，阎锡山派郭挺一来调解晋华厂的“劳资纠纷”。郭挺一是山西省工人委员会的主任，是个叛徒，他一来就批评说：牺盟会应该是仲裁地位，不应偏向工人一方。阎、赵二特派员当时说：“牺盟会是为了抗战才这样做的。”

在郭挺一的参与下，召开了有晋华厂方代表和工人代表参加的“调解会”，牺盟会的阎定础、赵道五同志也参加了会。谈了一天争执不下，郭挺一想用官方的气势压工人，牺盟会极力说明工人在停工后的困难处境，直到深夜才最后确定由厂里发给每个工人白面两袋。但工人代表认为太少，难以维持生活。两位特派员解释说：只能到此为止，要求过高了，官方和厂方都不可能答复，就会成了僵局，每人发两袋面也是我们斗争的大胜利。”说服了工人代表以后，就和厂方说妥保证第二天就开始发面。

在发动晋华纺织厂工人群众，要求厂方发给工人遣散费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，趁热打铁，立刻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工人抗日自卫队，保卫山西。工人群众在积极分子带领下，踊跃报名，一两天就有上千人报名。当时感到需要有教官来进行训练，阎定础就派范维屏去找省委要教官。省委书记张友清给了一名教官，叫周桂生，并解释说各地都来要教官，手里留得不多，只能给一名，要化装成川军的离队人员才好。需要便衣，范维屏就把上身穿的中山服脱下给了周桂生穿，周自己有一条侦察员穿的兰裤，就这样打扮起来，立即上路奔向榆次。第二天就把教官介绍给工人抗日自卫队的积极分子。周桂生向挤的满满的人们讲话，讲的有条有理，从日本帝国主义亡华政策，中国人只有抵抗才能有出路，讲到抗战必胜。决定工人自卫队从次日开始集中训练，地点在窑

上村。

工人抗日自卫队成立训练的事，被郭挺一知道后，就派了十多个旧军官来担任教官，全面夺取工人抗日自卫队的领导权。他们到来后强插到各队去活动，周桂生同志的工作受到干扰，无法进行，只好暂停训练。牺盟特派员出面交涉，让他们撤走。同时工人群众见来了一群旧军官，怕受骗编兵，就自动不来了。该旧军官等，看出插不上手，又生出一条计策，公开召兵，宣传说每人每月七元大洋，愿意的报名。当时工人正处在生活困难的时候，也有些人去报了名，并迁到北关的××巷去了。

牺盟会依靠积极分子带头，仍然集合起来数百名工人抗日自卫队员。训练地点还在窑上，这个地点距工人聚居的晋华街、寿安里较近，便于回家吃饭和照顾家务。十月中旬，八路军在榆次设“驻榆办事处”，办事处主任是赖际发同志，带来了一个教导五连，他们到牺盟会拜访，特派员提到缺教官，只周桂生一人招呼不过来，“办事处”答应派人帮助训练，几天后一个中队派去三人，直接帮助分队训练，这些人就是以后游击队的排长。

敌机轰炸加紧，窑上停留不住，就把训练地点迁到范家堡（近城村）。这一下是个大变化。因为有的人家里离不开，就没有再参加训练。以后，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情报，敌人已经越过娘子关，就将工人抗日自卫队转移到北田镇，同时，组织工人抗日自卫队的家属，撤离榆次城，上山安家，这一措施大大稳定了队员的情绪。

中国共产党在榆次

经过阎锡山的残酷镇压，抗战前榆次党的组织被打散了。几个知名的党员，于一九三五年冬、三六年春，在阎锡山实行大屠杀、大逮捕的政策下，不是转移外地，就是被捕下狱。（阎建寅

同志当时是党员，但组织关系在外地，他在白色恐怖下一直隐蔽在榆次的北田小学校，于三六年冬转移到了太原）。抗战开始后榆次党组织才重新建立起来，范维屏曾受省工委委托找原来是党员的桑梯（榆次城内人、在怀仁镇任教），向他表示可以恢复关系。但是当时他态度很消极，因此就没有恢复关系。桑梯抗战初期躲到南庄，当了那里的小学教员，曾动员南庄村的吕惠民参加抗战工作。（吕惠民后来当了榆太祁路西抗日县政府县长，直到抗战胜利，在解放战斗中 被阎顽军逮捕牺牲）。

榆次的党组织，开始由阎定础负责，榆次的牺盟会当时实际上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。党用牺盟会的名义，发动和组织了晋华纺织厂的工人运动，组织了工人抗日自卫队，并向郭挺一派来的旧军官做了坚决斗争，保证了党对工人抗日自卫队的领导权。后来北方局指示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严格分开。这时指定范维屏担任榆次党支部书记，榆次支部接收郑鹤龄为中共正式党员。榆次沦陷后，党员转移到东山，建立了榆次县委，由赵道五任县委书记，上山后接收郑允文为中共候补党员，候补一月，按时转正。

遵照华北局指示，上山以后，组织了军政委员会，赖际发任书记，阎定础、赵道五、李承文、周桂生为委员。

到了十二月末，经过敌人六路围攻以后，中共榆次县由阎定础任书记，赵道五任组织部长，范维屏任宣传部长，杨蕴玉任秘书。直到三八年五月，阎定础调第三行政公署，毛铎调任榆次县委书记，赵道五是组织部长，杨蕴玉是宣传部长，毛铎在榆次县委工作，仅三、四月时间就调走了，以后的县委成员是赵道五任书记，其他想不起来了。

在县委领导下有三个区委。一是高家山区，区委书记范秉衡；一是西窰区，区委书记是何光蕴；一是黄彩区，区委书记是刘子椿。

上山打游击

十月十五日以后，战局紧张极了。太原兵工厂库存枪支很多，当时的运输能力已经不能全部运走。牺盟总会趁机向阎锡山要一万支枪和相当的子弹，阎竟同意了。总会通知榆次分会去领枪，领回来二百支山西造六五步枪、一万发子弹和若干手掷弹，枪支弹药暂存公安局，当时公安局也已经惶惶不安了。大概过了五、六天，八路军办事处通知牺盟会，准备在最近一、二日内从城区撤退到城东山区。工人抗日自卫队二百余人，集合在公安局门前，由张玉麟等向公安局长交涉起枪，经过一番交涉，二百支枪，一万发子弹和手掷弹全部由工人抗日自卫队背上走了。两三天时间，由教导五连的同志们教给工人抗日自卫队队员怎样擦枪、拆卸枪，怎样瞄准射击，怎样扔手掷弹，紧接着就撤离了县城。

撤离县城也有斗争。榆次县长陈鸿宾，要阎定础同志和他一起行动，并要工人抗日自卫队也和他一起行动，阎随同陈鸿宾到了东阳镇，第二天，阎定础同志以到北田镇叫工人抗日自卫队的名义，脱离了陈鸿宾，到了北田镇和工人抗日自卫队会齐，这时和阎定础同志同时到北田的有刘金城（现名刘威）和杨玉辉。就在这时，还在县城的八路军办事处和一部分工人抗日自卫队，督促工人抗日自卫队的家属，从城区撤离到东山西窰、黄彩村，满载着队员家属的大车，一辆跟着一辆，都上了东山。

队员的家属全部转移以后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教导五连的一部，以及留在县城的工人抗日自卫队，也准备出发，这时来了一位身着浅灰毛人字呢大衣和法兰绒西装的人，带着一个小包袱匆匆来了。他就是隐藏在晋华纺织厂的共产党员李承文同志，他是得到通知后随即赶来一同撤退的。

在撤离榆次城前后，有几个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逃来的学生，如范秉衡（国民大学）、刘子椿（清华大学）、史修德（志成中学）、何光塾（北平×中学），或投奔朋友而后参加抗日队伍中来；或直接参加到游击队中来。

队伍从县城到了紫坑村就在这里设营。紫坑村子大这时正有一大批人，专支应过往军队，八路军来了，他们照样支应。

从县城撤离后，当时敌人还很远，李承文同志提意：晋华厂仓库很充实，有大量面粉、布匹、棉毯，利用这空隙时间，把仓库的东西运出来。赖际发同志同意，于是派工人抗日自卫队一部，教五连有民运工作经验的同志，协同李承文同志前去搬运东西，郝艾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这次搬运工作。这种搬运工作持续了两天，面粉、布捆堆满了一房子，并且随来随运到后方，直到听到炮声才停止搬运。

炮声紧了，退下来的军队也多了，这时赖际发才率教五连和工人抗日自卫队又到了山头村。到山头村后，第二天就听到机关枪响了，就是说敌人已经在五十里以内了，后来才知道日寇是从寿阳一路经过孟家井到太原，一路是企图从广阳经马坊到榆次，阻击我军，可是在广阳遭我八路军三八六旅伏击，伤亡很大，就放弃了这一路；孟家井这一路于十一月四日占领榆次。

在敌人占领榆次县城后，我八路军教五连和工人抗日自卫队曾派出侦察组，向榆次城方向侦察，尔后，派出一部向长凝镇进行侦察和宣传群众。前往的部队，在长凝镇街上与敌骑兵侦察遭遇，我先向敌开火，打死敌骑兵二人，缴获战马一匹、马枪二支、战刀两把、军大衣和子弹等。这是我军首次和敌军接触，长凝镇战斗后，预计敌人要报复，部队就从山头转移到马兰村。

这时，国民党士兵大批蜂踊溃退，沿村抢掠要银洋，奸淫掠夺无所不为，有的把支差的负责人用铡刀铡死。各村民众听说黄彩有八路军住，溃军就不敢去黄彩，就都到黄彩来请八路军。应

民众的请求，把一些有经验的学员分散到各村，保护村民安全，果然，溃军看见村口贴有八路军的宣传标语，就都由村外绕着走了。

建 政

抗日民族战争中政权是一面旗帜。在日寇占领榆次县城以前，阎锡山的旧县政府县长陈鸿宾就携巨款南逃，榆次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政府领导他们抵抗日寇的侵略。十一月十七日在上黄彩召开了同蒲路东、正太路南的各村代表会，到会代表一百余名。有郭村的代表，有中、东、西郝的代表，也有县城的代表。在会上由牺盟会特派员做了坚持抗日战争的报告，然后宣布选举县的抗日行政委员会，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进行选举，选举结果：城关代表范维屏、东长凝代表李亚泉、牛村代表吴俊祯、城内教员郑允文，还有牺盟会特派员赵道五当选为行政委员会委员、推选范维屏为主任委员，李亚泉为教育委员，吴俊祯为财粮委员，郑允文为军事委员。以后上报山西省第三行政主任公署批示，委任范维屏为榆次抗日政府县长，同时把行政委员会改称榆次抗日县政府。抗日政府建立后，在扩大抗日武装，保证军队给养，实行合理负担，铲除汉奸，组织民众抗日团体等都起到积极作用。

工人抗日自卫队上山以后，经过长凝战斗，道坪战斗，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编为八路军游击纵队榆次支队，周桂生任支队长，李承文任政治委员，活动于正太路南榆次、寿阳一带。三月后又整编为独立支队第一大队第二营。以后，县政府又以警卫连为骨干会合两个区游击队重新成立榆次支队，郑允文为支队长，郑鹤龄为政治委员。五六月间，“梅候支队”来榆次驻防，遂将榆次支队的两个中队编入梅候支队。榆次支队以一个中队为骨干，再进行扩充，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中，两次为地方主力部队输送相

当两营的兵员。此外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三八六旅七七一团，在榆次扩充了一个独立营，教五连一部学员以齐开宏、赵炳能为首，也在榆次扩充了一个特务营，这表明榆次县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很高，也表明抗日政府的工作是有成效的。

榆次地处正太、同蒲两条铁路的交汇点，因此敌我双方都极重视，日寇为占据交通线，在东长凝镇扎了据点，经常驻扎日军一个中队或不少于一个分队。我军也常有大部队到来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末，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旅部和七七二团，到榆次、黄彩一带（包括山头、紫坑）活动。三八年四、五、六月梅候支队经常驻扎榆次，当时保证军队给养就成了抗日政府的日常工作，为此在西堡、白佃建立了粮食仓库。

抗日政府征收粮款，采用山西省政府制定的“合理负担办法”。本着有钱出钱、有粮出粮、有人出人的原则，向钱粮多的大户多征，中等户少征，穷户不征。这种办法实行起来，富有户反对，但不敢不照办，穷户很高兴。因为以前都是按地亩摊派，富有户好地多，穷户没好地，这样一拉平富户就占了便宜，所以穷困户很欢迎合理负担办法。

抗日县政府一建立，立即号召各村民众组织抗日自卫队，农闲间站岗放哨、盘查行人，不放敌探奸细进入根据地，农忙时由儿童团放哨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贫困户缺粮无力耕种田地，当时立即组织贫困农民救国会，向富有户借粮。农救会成立后，妇救会、青救会都先后成立起来了。

这样，于一九三八年春，在中共榆次县委领导下，以抗日县政府为中心的抗日游击队、抗日民众团体都蓬蓬勃勃地建立起来了，榆次路东抗日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。

选自《榆次风雷》